

川渝地区石窟及摩崖造像调查研究综述 (2011—2020年)*

李 飞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 2011年至2020年,川渝地区石窟及摩崖造像相关调查研究成果中,基础资料的公布成果数量剧增,公布材料更为全面。逐步重视对小型散见窟龕的调查,此前偏重于川北地区的情况有所改变,川东及川西地区系统调查已经开展。同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除了传统的题材、样式风格、石刻题记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以某一区域或某一时代的窟龕为研究对象,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探讨川渝窟龕的发展变化;也有从建筑、景观等新的视角展开探讨。但是,基础资料公布不够、考古报告出版速度慢、已刊布资料信息不够全面、重视窟龕本地而忽略周边遗址等问题制约了相关研究开展。部分区域基础性的分区分期研究有待扩展和深入,对作为当前研究主体的题材的阐释存在大量重复性讨论,从基础的造像题材释读提升到对民众思想观念、信仰状况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

关键词: 川渝地区;石窟;摩崖造像;综述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surveys and studies on grottoes and cliff carving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from 2011 to 2020. In terms of the publication of basic materials, the number of achievement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ith a more comprehensive publication of materials. Reversed from focusing on northern Sichuan, scholars have been paying more attention on small-sized and scattered caves and niches, and carried out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Sichuan. At the same time,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findings have emerged,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research subjects such as themes, styles and inscriptions, scholars are increasingly targeting the caves or niches in a certain region or a specific era,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grottoes and cliff carving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in a larger space-time range. There are also studies from new perspectives, such as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nd so on. However, research progress is still limited due to insufficiently released basic materials and overdue public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reports, as well as over emphasis on the grottoes and cliff carvings themselves and ignorance of their neighboring sites. Fundamental research on subdivis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certain regions are worthy to be expanded and deepen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mes is the main subject at the present stage, which has been repeatedly discussed, while more attentions are required on the study of people's ide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mes.

Key Words: Sichuan and Chongqing, Grottoes, Cliff Carvings, Overview

*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2020年度省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川渝地区唐宋时期摩崖造像与地面佛寺关系研究”。

川渝地区是中国石窟及摩崖造像集中分布的一个区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末开始,一些学术单位和学者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并发表了大量考古简报和报告,同时围绕这些材料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

过去十年川渝窟龕的调查研究与此前相比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同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研究成果,调查方法更加科学,公布内容更为全面。在以往重视题材样式、题记题刻的传统研究基础上,更多学者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开展分区分期研究;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对摩崖造像的分布及景观方面的分析,对窟龕与地面建筑关系的探讨。^[1]

本文梳理了2011—2020年刊布的相关调查研究成果,总结了近年来的研究动向,在此基础上也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不足与缺失提出个人的浅见。^[2]

一 基础材料的调查公布

过去十年,石窟及摩崖造像的调查成果数量快速增长,高校和科研机构带着特定的学术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区域调查。四川大学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的支持下公布了通江、安岳以及川西区域大量窟龕的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围绕四川各地中小型散见窟龕公布了一大批小型窟龕的基础材料,目前已经出版达州卷、广元卷和自贡卷,同时公布了夹江千佛岩、仁寿牛角寨、安岳圆觉洞等大型窟龕的材料。西华师范大学主要对嘉陵江流域的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

本文以雷玉华的分区结论为依据对这些成果进行整理。^[3]必须指出的是分区的情况本身随着政治、军事局势以及道路体系的变动发生变化,目前的分区结论有待细化。同时,以现代行政区划作为分区框架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每一处造像所属的区域特点。

(一) 川北区

川北区地区以广元和巴中为中心,达州区域的

唐代窟龕从其文化面貌看可纳入川北区域范畴。除此之外,通江、阆中、旺苍、苍溪、仪陇等地的大部分唐代窟龕亦属于川北巴中造像区。^[4]

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和观音岩是最早开展系统考古学调查和研究的地点,已有众多调查简报及研究成果公布。2014年,《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正式出版。^[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广元境内的散见窟龕进行了系统调查,出版了《四川散见唐宋佛道窟龕总录·广元卷》,刊布了位于剑阁、苍溪、旺苍、昭化以及利州各区县境内的造像点26个,造像时代贯穿整个隋唐时期;^[6]另调查了剑阁境内5处隋唐时期小型道教摩崖造像。^[7]广元千佛崖石窟艺术博物馆编著了《千佛崖》图录。^[8]张宁、雷玉华、王婷等在最新的千佛崖莲花洞考古调查中通过考古学叠压关系的判断其始凿于北魏,改凿于武周时期。^[9]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对通江白乳溪、佛尔岩堰、野猪窝及佛爷田坝、朱元观音岩、诺江千佛岩等几处摩崖造像进行了考古调查,其中诺江千佛岩、白乳溪造像的主体年代为初盛唐时期;^[10]佛尔岩堰、野猪窝及佛爷田坝主体均为唐代道教造像,规模虽然不大,但对研究四川地区唐代道教造像的发展与传播有一定意义;^[11]朱元观音岩造像为四川地区罕见的元代摩崖造像遗存。^[12]

达州地区散见窟龕的资料已出版,从公布的9处唐宋时期的造像材料看,唐代造像主要受到了巴中地区的影响。^[13]

蒋晓春等所著的《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调查及研究》一书,公布了嘉陵江流域11处佛道造像材料,地跨川北与川东两区。^[14]其中川北地区主要包括广安冲相寺石窟、营山太蓬山石窟、^[15]阆中大像山石窟、阆中石室观窟、^[16]千佛岩石窟、雷神洞石窟、^[17]佛子岩石窟、^[18]南充青居山石窟、万山寺石窟;蒋晓春等还对四川剑阁老君庙石窟进行了简单介绍,根据造像题材以及题刻内容考订其时代为唐初贞观年间。^[19]

(二) 川中和川东区

川中和川东区指四川盆地以东的四川中、东部及重庆部分区域,属于沱江及嘉陵江流域,辐射范围可达川南的泸州地区。这一地区以安岳和大足为中心,是近年来调查和研究的重点区域。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对安岳县菩萨湾、^[20]安岳上大佛、^[21]舍身岩、^[22]侯家湾、^[23]长河源石锏沟、^[24]高升千佛岩、^[25]偏岩乡佛岩、^[26]高升大佛寺、社皇庙、雷神洞、^[27]三仙洞、^[28]人人和云峰寺、^[29]玄妙观、^[30]双龙街菩萨岩^[31]等地点进行调查并刊布了简报,这些窟龕的时代从唐代延续至明代,题材上包括佛道造像。西南民族大学石窟艺术研究所公布了安岳茗山寺的材料。^[32]曾德仁发表了安岳县玄妙观道教摩崖造像的材料并作了初步研究。^[33]大足石刻研究院等单位出版了《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公布了卧佛院造像及刻经的情况。^[3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出版了安岳圆觉洞的考古调查报告,对82龕(窟)造像作了详细记录,并对龕窟形制、题材内容、区段组合及时代作了分析。^[35]

雷玉华公布了乐至圆佛寺发现的2龕北朝佛教摩崖龕像,认为其是四川地区佛教传播至乡村的最早实物资料。^[36]

大足石刻研究院编写了11卷19册的《大足石刻全集》,这部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国内大型石窟寺(摩崖造像)中将大型石窟一次性编写出版的考古报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报告通过多种类型的线图、照片、效果图、地形图以及准确全面的文字记录,初步达到了“万一洞窟毁掉可以靠测图记录予以复原”的程度。同时全集的很多内容已经超出了传统考古报告的范围,如对地质构造、岩层、历年来保护维修记录的详细描述、多角度的索引、历史照片的收集整理都体现了编者全面的思考,对川渝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具有重要借鉴意义。^[37]另外,研究院对北山石窟调查中新发现的14则铭文、11龕造像及此前未关注的窟龕形制、造像题材、装饰纹样等予以公布。^[38]对大足妙高山、^[39]三存岩、^[40]峰

山寺摩崖造像^[41]进行了调查。邓启兵等对宝顶山周围16处宋代造像的形制、造像、铭文、后期遗迹等作了全面介绍。^[42]米德昉公布了大足区宝顶山圣寿寺毗卢庵造像的材料,并就图像的内容、时代、毗卢庵的功用以及圣寿寺与大佛湾造像的时代先后进行了探讨。^[43]杨光宇公布了重庆大足三宝寺摩崖造像的资料,并就内容进行了考释。^[44]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出版了《潼南千佛寺》考古报告,公布了于2011年发掘的43龕唐宋造像资料。^[45]王玉选择铜梁、潼南、合川境内几处窟龕中的重要地点进行调查,并作了初步研究。^[46]《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调查与研究》一书刊布了重庆合川龙多山、^[47]钓鱼城石窟的资料。^[48]重庆江津石佛寺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晚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寺院遗址,遗址格局按照功能不同主要可分为寺庙建筑基址区、石上建筑遗迹区、摩崖造像区以及墓葬区等,目前已公布了2016年度考古调查和试掘简报,该遗址的发掘对川渝地区同类型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和借鉴作用。^[49]

(三) 川西区

川西区指金牛古道旁绵阳及其以南的四川西部区域,以成都为中心,属于岷江流域及嘉陵江支流涪江流域。此前对川西地区资料的调查和公布相对较少,近年来,工作力度加大,刊布了大量新材料。

《四川盐亭龙门垭摩崖造像调查简报》一文刊布了该处南朝至唐代的26龕造像。^[50]但其中南朝造像的时代判断可能存在问题,最早的造像时代当在隋、初唐时期。

夹江千佛岩的调查报告公布了千佛崖造像的详细资料,并对该处造像开凿过程、分期等进行了探讨。^[51]都江堰文物局对三佛洞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该处共保存9龕造像。^[52]成都市文化局等对成都大邑县境内的药师岩和佛子岩两处窟龕进行了考古调查,出版《四川大邑县药师岩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考古报告》,该处以唐末五代和明代摩崖造像为主。^[53]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新津县老虎山6龕明代造像的材料。^[54]西华师范大学对邛崃盐水村夫子岩摩崖造像作了调查,该处主要开凿于晚唐五代时期。^[5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仁寿牛角寨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出版调查报告。^[56]张毅、李勇等主编了《仁寿石刻》图录。^[57]符永利等对仁寿冒水村大佛沟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该处现存造像7龕、碑刻1通、题记8则,时代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民国。^[58]四川大学对仁寿鳌陵乡黑龙寺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该处现存造像18龕,开凿时代为中晚唐时期。^[5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仁寿大化镇杀人槽摩崖造像进行了考古调查,该处保存有14龕造像,开凿时代为公元9世纪上半叶。^[60]符永利等调查了洪雅县苟王寨摩崖造像,并刊布了内容总录,该点现存造像24龕91尊,碑刻题记17则,基本开凿于明代。^[61]胡同庆对沐川千佛崖石刻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并对雕刻内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62]

除了以上各区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出版了《四川散见唐宋佛道窟龕总录·自贡卷》,^[63]另对宜宾高县的半边寺明代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64]

2011年至2020年期间新材料公布的数量及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除了对大型、集中分布的石窟的关注,调查者亦开始重视对小型散见窟龕材料的调查。同时此前偏重于川北地区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川东及川西地区的系统调查都已经开展,这对研究者全面了解和掌握川渝地区窟龕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个地区分区分期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段的简报和报告与此前仅选取部分窟龕公布的方式相比,材料公布更为全面,基本上对一处地点的每一个窟龕都进行介绍。同时与此前仅重视南北朝及唐宋时期造像的情况相比,明清造像信息也被完整记录。

二 学术研究

与资料刊布大增相伴的是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与此前以单一地点的讨论研究以及集中对题

材、艺术风格的讨论相比,这一时段大量的硕博论文以某一区域的分区、分期为研究重点,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开始系统探讨川渝石窟及摩崖龕像的发展变化。以大足石刻等大型石窟为研究对象,近些年出版了多部论文集,成果涉及川渝窟龕的各个方面。^[65]同时,亦有研究从更多新的视角展开,比如从建筑、景观等角度的探讨。

(一) 综合性研究

川渝窟龕数量巨大且分布极为分散,综合性研究的开展难度非常大,需要建立在长期田野调查以及对材料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雷玉华《四川石窟分区与分期初论》一文正是基于作者长期、系统的考察形成的对川渝石窟及摩崖造像的分区分期的系统性研究。尽管限于篇幅,难以充分展开论述,但是作者已经把整个川渝地区纳入到分区分期体系。作者根据历史交通、行政区划以及造像特征,把川渝地区窟龕分为川北区、川西区、川中和川东区三大区域,并根据纪年材料和龕像特征,将窟龕分为七期,从宏观上客观总结了整个川渝窟龕的实际发展情况。随着大量资料的公布,这项研究仍然有非常大的细化空间。

胡文和与胡文成的《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是近期出版的巴蜀佛教雕刻的大部研究成果,该书全面搜集了川渝地区的佛教雕刻资料。在石窟及摩崖龕像方面,作者在2~6卷分地域论述了广元、巴中、“西蜀”、安岳、大足等各个区域的造像时代、题材以及艺术特征。^[66]

(二) 区域和时代研究

这一阶段的区域性研究数量大增,成为了硕博论文的热门选题。这些研究通常以某个区域或者某处大型窟龕的分期研究为主,并附以对某些具体题材的考察。其中大量研究以考古类型学研究为基础,充分发挥了考古学在处理大量基础材料上的优势,也有一些研究主要使用艺术史的方法。

川北地区是目前研究最为充分的地区。姚崇新与雷玉华分别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

心》^[67]与《巴中石窟研究》^[68]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广元及巴中地区的几处大型窟龕进行了研究,并对其中部分造像题材作了考证。在以上研究基础上雷玉华等新出版的《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一书增加了对地处广元与巴中之间、广元与成都之间的中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的探讨,试图建立起整个川北石窟的年代发展序列;同时对川北石窟的社会历史背景、来源及其与四川其他地区石窟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69]《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龕窟总录·广元卷》“初步调查分析”一节对广元散见龕窟进行了研究,对龕窟形制、造像组合及内容、造像题材及特征、题记作了分析,将广元散见石窟分为了四个时期。^[70]徐强对川东北区域内的唐宋零散龕窟进行了介绍和初步探讨。^[71]王守梅对广安冲相寺石窟的历史与造像进行了研究。^[72]

川东地区是最近几年研究的重心。陈晶鑫和王丽君均以安岳石窟为研究对象作了博士论文,^[73]与陈晶鑫的论文相比,王丽君在材料收集上更全,类型分析也更为细化;陈晶鑫将安岳龕窟分三期,王丽君则分五期;陈晶鑫将更多的篇幅放到对造像题材的研究。余靖对安岳千佛寨的摩崖造像进行了考古学研究。^[74]张媛媛和黎方银对大足北山佛湾石窟作了考古学分期研究,通过系统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将北山佛湾分为三期六段,并对各期段的历史背景及造像特征作了总结。^[75]任婧将安岳卧佛院龕像分作三期,考察了造像龕与刻经窟的分布与组合情况,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体的规划与发展演变。^[76]范丽娜对合川涪滩二佛寺宋代石刻造像进行了考察,试图厘清二佛寺的开凿次序以及背后宗教内涵的转变。^[77]

张亮以川西石窟作为研究对象,硕士论文对丹棱郑山摩崖造像进行了考古学研究,^[78]博士论文则对整个川西地区的石窟进行了考古学研究,将该地区造像分为六期,并对僧伽及白衣观音两个题材进行了深入研究。^[79]谭登峰对丹棱龙鹤山摩崖造像进行了初步研究。^[80]卢丁对成都周边唐代石窟造像样式的来源及相关问题进行

了探讨,推测初唐时期成都周边开龕造像的做法来自中原和川北,但是造像样式或受成都寺院造像、绘画样式的影响。^[81]于春对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进行了初步研究,将现存摩崖造像分为六个造像区,并初步分为五期,对各期的特征进行了总结。^[82]

蒋晓春等人突破了传统的分区框架,将整个嘉陵江流域的窟龕作为研究对象,以流域内纪年造像为基础作了分期研究。^[83]于春则关注到了蜀道两端长安和蜀地的佛教艺术交流情况,分期论述了两地交流的情况。^[84]

与区域性的分期分区研究相比,对小型窟龕及单独某一个窟龕的探讨更为深化。姜宝莲将广元千佛崖大云洞窟内造像分为了三期,将前两期的分界线定在武则天称帝前后,^[85]但作者仅根据造像题材特征等作出的时代推测可能并不准确。雷玉华对大云洞设计思想和开凿顺序的论述更为合理,通过对壁面造像细致的考古学观察,推测大云洞最初计划设计成中心坛背屏式窟,因开凿过程中遇到裂隙改变了原有的开凿计划,大云洞开凿的时代大致在开元三年至十年之间。^[86]

符永利等对阆中大像山窟龕的形制、题材以及年代进行了研究。^[87]

林圣智对绵阳平阳县君阙上的造像进行了研究,对其中南朝造像的图像来源、造像与八关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萧梁时佛教徒于阙上造像,有意识的把原先具有丧葬含义的阙改造为了佛教纪念碑。^[88]符永利等对阙身造像进行了分期研究,对选择阙身进行造像的意义以及造像中的三足香炉与博山炉图像进行了研究。在对选择阙上造像的意义方面,两者有相似看法,但对于阙身造像的时代则存在不同看法。^[89]

温玉成等认为成都龙泉驿北周强独乐造像34号龕的佛道合龕造像是北周文王碑中所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造像”。^[90]雷玉华从考古学叠压打破关系入手,结合龕像特征,得出同样结论,并提出龕内像在北周武帝灭佛时可能就遭到了破坏,经过后代改刻、增补形成了现在的

状态。^[91]胡文和对何恩之认为的蒲江飞仙阁9号窟时代以及造像题材受到滇缅道而来的“波罗样式”影响的观点作了回应,认为其源流应出自“长安模式”,作了本地化的改动。^[92]

除了区域以及单独窟龕的探讨,亦有学者对特定时段的造像进行了研究。龙红等对巴蜀地区隋代石窟的造像题材、艺术特征、造像渊源作了探讨。^[93]另对唐以前巴蜀窟龕形制及造像特征的来源进行了分析。^[94]邓新航的硕士论文对巴蜀北魏晚期、北周和隋代的石窟龕像的题材、艺术特征渊源等进行了探讨。^[95]王剑平、雷玉华全面梳理了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四川造像,归纳这一时期造像的特征,对这一时期道教造像的兴起、龕窟的形制与装饰、造像题材和风格几个问题进行了总结,对历史背景和艺术源流进行了研究。^[96]八木春生用艺术史的方法将广元千佛崖武周至开元时期佛教造像分为三期,对各期造像特征的流变作了梳理。^[97]

(三) 造像题材研究

对造像题材的研究数量最多,吸引了众多学科研究者的参与。就目前的情况看,大部分的造像题材已经被讨论研究。除此之外,造像组合也为研究者所关注,如观音、地藏、药师以及陀罗尼经幢等组合的宗教和社会意义被广泛探讨。从研究的地域来看,对川北地区造像题材的关注大大减少,而对川东地区的关注不断提升,相关研究的数量也远超其它区域,这与该地晚唐以降不断涌现出新的造像题材有关。从研究方法上看,有将造像与经本对照,进而判断某一造像的题材;有全面收集某一题材的图像进行考古学或图像学的研究,并与敦煌等地的同类题材比较,分析其演变序列;更多的是结合历史背景来探讨题材出现和流行的社会意义。

任婧以安岳卧佛院《涅槃经》与涅槃像为切入点,梳理了《涅槃经》的传译及涅槃图像的流布情况,作者认为卧佛院的涅槃像主要根据第59窟和第66窟刊刻的昙无讖本《大般涅槃经》制作,单一的文本来源是其不同于同时期中原北方涅槃变的重要特点。^[98]米德昉等对大足北山多

宝塔内“娑罗双林示寂”造像内容进行了考释,对其中锡杖、执幡菩萨等图像作了考证。^[99]黄能迁等对宝顶山大佛湾第10号龕的佛传内容作了辨识。^[100]

董华锋关注了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龕第103龕的菩提瑞像在唐末至五代被作为毗卢遮那佛妆彩的现象,认为其反映了瑞像信仰衰落、毗卢遮那信仰初兴的信仰变迁。^[101]陈清香以大足毗卢遮那佛为切入点,对川渝唐宋时期毗卢遮那佛图像特征作了梳理总结,分析了毗卢遮那佛顶上眉心放光的经典依据。^[102]高秀军亦探讨了宝顶山石刻中的毫光,认为毫光造像是唐代西方净土信仰盛行的产物,大足等地毫光形象的多样性表现以及区域化特征与信仰传统、造像主持者及工匠对造像的理解有关。^[103]孙明利根据相关材料认为“毫光”应为“光明转”,梳理了川渝唐、五代观无量寿经变中光明转与宝船两种图像的宗教意义以及流变趋势。^[104]

张亮等对丹棱石佛湾、佛儿崖石窟中的五十三佛、二十五佛造像及其来源、性质以及三阶教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研究。^[105]

滨田瑞美对夹江千佛岩中的三佛龕和四佛龕进行了分类研究,对其尊格作了考辨,亦对尊像组合的组成给出了宗教学的解释。^[106]

符永利等对广安冲相寺定光佛龕像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开凿于隋开皇八年,反映的是早期定光佛信仰;所饰的太阳纹头光可能是由古印度犍陀罗起源,经西域、河西、巴中等地传至冲相寺;手印表现的是本生授记和三童子缘。^[107]

陈佩姣总结了四川地区的药师佛造像特点,手持器物蕴涵的意义,药师经变的情节内容,借此探索药师信仰的历史及宗教背景,对四川与敦煌药师图像的形象、组合、构图以及形成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108]符永利梳理了川渝地区唐宋药师佛龕像,对龕形、造像特征以及组合进行了类型学分析,通过研究认为川北时代较早,组合简单,越向南发展年代相对较晚,组合也越复杂化;在唐晚期五代以后药师常与释迦、阿弥陀佛、观音、地藏等根据民间的实际

需求进行多种组合,体现了民间宗教的实用倾向。〔109〕史文瑶关注了安岳石窟中的药师变和药师经变,并与巴中、夹江、资中等地的同类题材作了比较。〔110〕米德昉对唐宋时期大足的药师造像进行了考察,分为单尊、与眷属的组合、药师七佛、与非眷属组合几种类型,并对照经本作了阐释。〔111〕张亮对川渝地区9—10世纪的日、月光菩萨造像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从药师信仰中衍生,但随着信仰的变迁,从药师信仰体系分解出来,成为具备特定信仰内涵的固定组合与全新题材,其直接来源可能是《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记述,而图像粉本来源于当时成都寺院壁画。〔112〕

江滔和张雪芬全面梳理了四川地区的19龕地藏十王造像,对龕形、造像内容、组合进行了类型学研究,给出了分期演变序列,在此基础上作者初步探讨了造像布局形式的形成原因。〔113〕李小强对大足北山第253龕的题材进行了研究,认为主尊地藏观音与十王的组合以及侧壁检亡人家功德使者和两身道教造像题材的出现与唐宋时期道教题材进入水陆会有关。〔114〕

张亮通过与敦煌相关图像的对比确认大邑药师岩K7-2左侧的经变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尊胜变与尊胜幢之间有替换的关系,同时通过分析尊胜幢与地藏、药师等的组合关系认为唐末五代的信众造像活动对现世、死后、来生有着通盘考虑。〔115〕董华锋等梳理了川渝地区晚唐五代一类形制特殊的小型经幢材料,认为其“安于江中”,注重对“河伯水官”“水族之类”及“溺死者”的救度,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川渝地区的水患问题,也可能与水陆法会有关。〔116〕

姚崇新、肥田路美等学者较早的关注了地藏、药师、阿弥陀、观音、尊胜幢等在川渝地区组合出现的情况,并对这一现象的社会宗教学意义进行了阐述。姚崇新对大足北山第279和第281龕造像中药师、地藏及尊胜陀罗尼经幢的组合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缺乏经典依据的组合表现了晚唐五代以后造像为今生、来世、生人、亡者的通盘考虑更加全面,体现了从宗教狂热逐渐走向理性、现实。〔117〕肥田路美对夹江千佛岩造像中

的地藏、观音并列像作了研究,而对其宗教和社会意义,已经在其早期的著作中作了阐述,〔118〕认为与其它图像一样是中晚唐在川渝地区广泛传播并相对固定的造像形式,地藏手中的心叶形环状持物可能受到了当地流行的千手观音“玉环手”的影响,而图像中出现的七佛认为可能是七斋活动中对应的各本尊像。〔119〕

观音信仰的盛行促使观音造像大增,各种形式的观音造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齐庆媛主要梳理了江南式白衣观音的发展,她将江南地区率先创造的一种冠搭披风且与外衣一体化、两手在腹前交叉并持数珠的新样观音称为江南式白衣观音,对白衣观音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其中涉及到川渝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的多处白衣观音造像。〔120〕未小妹对川渝地区如意轮观音造像进行了研究,梳理了如意轮观音的汉译经文以及画史和现存于国内和日本的如意轮观音图像,分析了图像传播和演化过程。〔121〕李小强、廖顺勇通过对大足安岳地区数珠手观音的造像组合以及单体造像的分析,梳理了图像发展的过程。〔122〕李涪主要从美术学和图像学的角度对四川宋代菩萨像进行研究,该书的主体是对宋代菩萨像结构特点和图像变迁的梳理研究,在材料的处理方面更偏向于美术层面的总结。〔123〕李冠畿主要研究了内江普陀岩和圣水寺的两铺晚唐五代前后的观音救难图像,通过与敦煌地区的相关图像对比认为其或有相同的粉本来源。〔124〕李小强考察了大足现存8例宋代十圣观音造像,认为十圣观音的题材并没有直接对应的经本,出现可能受到了“千手观音”题材的影响,更多来源于民间传说和信仰。〔125〕

李崇峰以大足宝顶山千手千眼观音像为切入点,梳理了有关千手眼大悲像相关经本及图像在华传译和传播的情况,认为中土千手眼大悲像是在达摩战陀所制“祖本”和武则天敕赐“粉本”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伽梵达摩译本创作的,但中土晚期的图像中出现了脱离最初“粉本”的现象,造型程式也出现了地方化和世俗化转变;文章全面梳理了相关的文献材料,特别提到了佛

典与图像的对应关系问题应当关注时间和流传序列、粉本的“嬗变”以及“地方化”问题，这都是川渝窟龕题材研究中应当重点注意的。^[126]罗翠恂以夹江千佛岩084号龕为切入点，梳理了四川唐宋时期千手观音的造像，认为这一造像题材均属于伽梵达摩所译《千手经》系统造像，《千手经》系统造像流行的背后可能是对陀罗尼的高度重视，说明中唐以后《千手经》所称扬的大悲咒信仰极为繁盛。^[127]姚崇新对大足唐宋时期千手千眼观音造像进行了研究，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同时总结了造像的地方特征，如新眷属文殊、普贤、地藏的出现、凸显供养人地位和以半身力士托抬宝座的形式。^[128]

卢少珊梳理了四川唐代摩崖浮雕的维摩诘经变材料，认为四川维摩诘经变呈现浓厚地域色彩，其与西方净土类图像的组合反映了唐代维摩诘信仰与净土信仰融合的趋势。^[129]米德昉对大足北山南宋绍兴时期所作的线刻维摩诘经变材料进行了探讨，纠正了历代记载中存在的阙谬，认为其与敦煌唐前期的作品相似，可能粉本在唐代已由中原传入蜀地。^[130]

吴仁华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要对比了敦煌以及川渝各地净土变相的一些图例，归纳了川渝地区相关图像的特征。^[131]姚瑜以北山245龕观经变、宝顶18龕观经变为中心，从大足地区观经变的图像内容、图像意涵方面作了对比分析。^[132]

毗沙门天王造像是唐宋时期川渝地区流行的题材。霍巍以四川大学博物馆的一尊唐代毗沙门天王单体石刻像为切入点，对比于阗和敦煌的相关资料，对毗沙门天王像从于阗传播到敦煌和益州的风格演变进程及其历史背景作了分析，作者认为益州发现的毗沙门天王像主要继承了由“于阗样式”发展而来的“敦煌样式”，但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于吐蕃的影响。^[133]大岛幸代研究了夹江千佛崖造像中的毗沙门天王题材，将千佛崖的毗沙门天王像分成了步行式和直立式两种类型，根据经文对眷属的身份作了考证。^[134]刘刚对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毗沙门天王造像进行了

整理分析。^[135]

僧伽以及三圣造像是川渝地区唐宋造像的一种重要题材，牧田谛亮、徐莘芳、马世长、罗世平等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探讨，近十年关于这一题材的探讨主要围绕一些新发现的造像和经变图像展开。刘青莉、姚崇新对安岳西禅寺石窟僧伽三十二化像作了研究，对该龕造像的内容进行了释读，并结合文献对其形成及演化的过程作了分析。^[136]李小强等以成渝地区的4龕僧伽变相作为考察对象，对图像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考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僧伽变相在川渝地区的流布情况，作者认为图像有从“十化”“三十二化”“三十六化”逐步增加的趋势。^[137]张亮等解读了川东调查新发现的两铺僧伽变相，对川渝地区僧伽变相图像的发展序列进行了分析，将包含僧伽题材的图像分为四类，这些图像的粉本都应当来自于长安。^[138]梅林等主要考证大足七拱桥6号窟题材并非地藏，而是僧伽“三十六化”。^[139]肥田路美对夹江千佛岩91号三圣僧龕进行了研究，认为是僧伽、宝志和万回三圣僧的组合造像，造像的意图可能是护佑水路航运的安全；作者认为千佛岩的造像与日本现存的一些唐代从长安带回的旃檀造像异曲同工，其开凿的粉本很有可能也是长安流行的旃檀像。^[140]徐汝聪主要梳理了各种材质僧伽造像材料，其中涉及川渝地区的材料。^[141]高秀军等也考释了资中月仙洞新发现的两龕僧伽变相，特别提到僧伽变相和十一面观音造像可能存在的组合关系。^[142]郑式的文章用很大篇幅探讨历代文本中僧伽形象的层累式塑造，越晚的叙述越详细，僧伽也从高僧、神僧再向佛化的神祇转变，文本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造像中僧伽样式的转变，作者探讨了石窟、影窟、寺观、影堂、塔以及墓葬中僧伽形象的出现原因、演变等，提出了僧伽图像“在地化”而非“中国化”的命题，即僧伽造像本就是中国本土的文化现象，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143]

张雪芬详细辨识了安岳卧佛院五十三参浮雕造像，认为其与惟白《文殊指南图赞》文本有密切联系，造像年代在北宋末至南宋初的十余年

间。^[144]张媛媛亦对善财童子与五十三参图像进行了整理研究。^[145]刘静认为宝顶圆觉洞和石羊华严洞左右壁的图像并不是五十三参,而表现的是《圆觉经》中菩萨向佛问道的情节。^[146]

刘光雨梳理了《华严经》、华严信仰在四川地区的流传情况及川渝地区华严三圣造像的情况。^[147]黄夏对安岳毗卢洞千佛洞的千佛作了考察,认为三尊像的身份应为“华严三圣”,作者认为千佛式的人物像是供养人的替身。^[148]

叶潜对大足宝顶山圆觉洞的跪像身份做了考辨,认为圆觉洞的图像应该与窟外的“牧牛图”等连在一起解读,跪拜像不是十二圆觉菩萨的化身,而是一尊经过禅宗渐悟修行圆满后进入更高修行阶段的菩萨,修行者经过“牧牛图”所揭示的人间修行圆满,后进入圆觉洞内作菩萨道修行。^[149]卜向荣同样对第29窟圆觉洞的长跪菩萨像进行了分析,认为这尊菩萨像不仅代表《圆觉经》中十二大菩萨依次拜佛请教的特殊场面,还可以被理解为调解人间与佛神世界、真实与表征之间的“居间图像”。^[150]

弓晓梳理了川北地区力士造像的窟龕分布及组合,在此基础上作了型式排比,将隋唐力士造像分为了四期。^[151]雷萌对巴蜀地区隋唐时期天龙八部中的天众造像图像进行了研究,将造像分为了三期,并简单探讨了图像的来源。^[152]

《西游记壁画与玄奘取经图像》一书全面搜集了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北宋至清代的玄奘取经图像与西游记壁画,其中玄奘取经图涉及了川渝地区泸县延福寺第8窟、大足北山第168窟和妙高山罗汉洞。^[153]李小强等考察了大足北山和妙高山的两组取经图,认为时代都在北宋末南宋初,从组合上看与敦煌和延安地区相应图像都有差别,均出现在罗汉群像之中,两处造像对于探讨《西游记》的成书时代有重要意义。^[154]

赖依缦分析了一字佛顶轮王向炽盛光佛的信仰变迁以及图像变化,其中涉及大足北山、石篆山的炽盛光佛造像,作者将这种变化放在了“唐宋变革”的大命题中考量,认为唐晚期以来政府控制力松动、民间信仰发展等都推动了这种

转变。^[155]周洁对大足地区五代、两宋的星曜造像进行了图像学研究,探讨这种图像渐次受到密教造像实践以及道教影响进而“道教化”的过程。^[156]

符永利认为重庆龙多山田湾3号龕造像分别为达摩、慧可和宝志化现的十一面观音像,年代大约在唐末五代,该组合不见于经本,出现与唐宋之交禅密结合与达摩、宝志同作为观音化身,而三者又与传法脉络有关。^[157]

吕德廷分析了大足圣水寺和北山佛湾中摩醯首罗天的形象,并与高昌回鹘与大理的相应形象作了比较研究。^[158]

胡文成探讨了诃利帝母像的衍变,其中涉及巴中南龕及大足石刻中的诃利帝母像,作者认为唐代的小儿保护神向宋代“送子神”,甚至化身为“送子观音”的身份和职能变化是其形象变化的主要原因。^[159]

褚国娟根据民间信仰的诸神谱系、图像特征以及工匠信息推测石篆山3号龕可能是冥界地方性职官土地神与风水文化中具有土地职司功能的龙神的合龕。^[160]

陈瑛梳理了孔雀明王经典,认为孔雀明王的形象大致是根据不空所译经本确立的,同时分析了经典演变与经变图像的相衍关系,安岳大足地区的造像主要源于玄宗和僖宗播越带来的长安粉本,图像的流行与赵智凤在安岳大足一带的传教相关。^[161]杨筱同样分析了大足和安岳6例石刻孔雀明王图像配置、窟龕组合,认为巴蜀地区孔雀明王图像始终以不空仪轨为根本,借鉴、吸收了显教造像与民间信仰中相关因素。^[162]

董华锋和张亮对唐宋巴蜀地区十六罗汉造像做了初步研究。^[163]干倩倩对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的十六罗汉和十八罗汉题材进行了整理研究。^[164]

邓宏亚对四川唐代佛道合龕摩崖造像进行了研究。^[165]李光明对大足石刻中的三教合区、合窟的造像形式作了初步探讨。^[166]刘睿认为绵阳玉女泉31号龕的天尊、老君合龕像反映了唐代官方和民间造像两种传统的互相融合。^[167]李淞整

理了大足各地主要的宋代道教造像，并将这些遗存置于宋代道教艺术的大框架之下梳理四川、重庆道教造像谱系。^[168]胡文和对大足宋代道教神祇图像的源流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反映了北宋初期修建玉清昭应宫、天庆观时对唐、宋道教神祇图像的整合。^[169]李小强释读了大足境内年代较晚的道教石刻佛儿岩石窟的内容，认为在造像题材和图像样本上，与大足境内其它南宋道教造像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170]

王苒滢对四川唐宋摩崖造像中的供养人像进行了整理研究。^[171]王海涛、王婧等主要对大足乃至整个四川窟龕中的舞蹈形象进行了研究。^[172]

启门图在宋代普遍出现，李金娟关注到大足石篆山佛塔和北山弥勒下生经变石刻的两处启门图，其与弥勒信仰相关，体现出特定时空关系下的特定含义。^[173]

陈明光对大足宝顶山报恩经变构图、内容、布局、图文及旨趣作了总结。^[174]

李小强解读了大足石壁寺石窟的题材内容，结合石壁寺嘉定三年碑对水陆会的原因、作用、仪式、奉请的神灵以及碑文所记的参会人员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175]侯冲通过梳理宋代佛教仪式文本以及相关的文字记载，认为大足宝顶为佛教水陆道场。^[176]戴晓云对侯冲大足宝顶山是佛教水陆道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混淆了瑜伽教和水陆法会的概念，大足宝顶山中一部分图像是依据《新集竖宗立教兼济混融孝顺供拔苦报恩道场仪》雕凿的。^[177]邹建林探讨北魏以来即已存在的“庆赞”传统，鉴于造像题记中也有“修水陆斋庆赞”的记录，认为水陆法会是从一般性的斋会发展而来的。具体到石篆山的严逊造像而言，他认为严逊应该是修水陆会为造像表示“庆赞”，而不是为修设水陆道场而造像。^[178]

丁明夷以《川密：四川石窟体系的发展轨迹》为题，将川密在四川石窟中的发展分成了孕育期、成长期和完成期三个阶段，梳理了每个阶段的特征。^[179]邓新航在前人基础上对巴中石窟的唐宋密教造像如意轮观音、数珠手观音、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毗沙门天王等题材进行了梳理。^[180]

由以上梳理可见，目前对于造像题材的研究数量非常多，绝大多数的题材均有所涉及，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川东和川西等地系统考古学调查的开展，新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造像内容，研究者围绕这些造像对其内容进行了释读与研究。

结合经本对窟龕内容和题材的推定、对题材样式流变的总结以及宗教学及历史学角度的阐释是题材研究的重点。在题材的推定方面，绝大多数的题材已经被辨识和讨论，另外一些较为少见的题材随着系统考古调查被发现并关注。在样式的流变上，更多跨区域存在的图像被研究者们关注，他们结合敦煌、洛阳、陇右、陕北、日本等地的材料来深入讨论图像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演变及背后的动因。而在宗教学及历史学的阐释过程中，很多作者都着重关注了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川渝地区的宗教信仰发生的实用化、世俗化与民间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深刻影响到了造像。但研究成果质量良莠不齐，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复论述，对某些题材内涵和宗教意义的过分解读都是其中存在的问题。

（四）服饰纹样研究

艺术史、雕塑史等方向的研究者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对服饰纹样以及造像构图、技法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参考视角，同时也为物质资料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但部分讨论过分泛化而缺乏实质性的分析，使得其学术价值大大降低。

陈悦新运用类型学方法对安岳和大足的佛衣及菩萨衣进行分析，两地均分为两期，即唐五代和两宋时期，同时探讨了佛衣样式的来源，两地盛唐至五代继续流行唐两京地区的佛衣样式，两宋时期除了继续流行中衣搭肘式佛衣和菩萨衣外，露胸通肩式佛衣和菩萨衣较为普遍，反映了两宋时期地方文化盛行的独特面貌。^[181]邓启兵研究了大足北山石刻中部分造像所穿的军戎服饰，认为其反映出了晚唐至两宋时期军戎服饰的发展变化。^[182]

徐顺智对安岳石窟的装饰图案进行了梳理。^[183]刘云对巴中石窟的龕楣纹样进行了美术学层面的梳理。^[184]张蓓蓓整理了大足和安岳佛教石刻中云纹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185]龙莉对大足石刻中的花卉鸟兽图像进行了梳理。^[186]

齐庆媛通过服装、装身具与躯体形态三个方面的比较分析了宋代石刻菩萨像造型的发展情况;^[187]同时对四川宋代菩萨像的宝冠造型作了整理研究。^[188]

(五) 刻经及题刻研究

这两者因为均侧重于对石刻文字的考察研究,故笔者将其放在一起讨论。对安岳等地佛教石经的研究此前多独立于造像的研究,但结合石经经本及相应造像类型、题材的研究才能更全面的反映其缘起以及意义,研究者对卧佛院刻经与造像关系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对佛教造像题记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题记透露出来的窟龕年代、造像题材、供养人信息、工匠信息、法式法会以及背后的历史信息和信仰观念理应成为研究的重要层面,但过去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具体历史和事件的考察,缺乏基于全面的题记信息进行宏观分析的研究,对供养人群体、工匠群体、发愿内容以及背后反映出的信仰状况及社会状况的探讨有待深入。另外,研究者以往多关注与窟龕开凿相关的开龕题记,对后期的妆彩题记和游记缺乏关注,而这些内容恰恰能反映信仰状况以及历史背景的变动。

雷德侯等主编的《中国佛教石经(四川省)》一书三卷详细公布了四川石经的相片、拓片、版式录文、隶定录文、英文翻译、研究史和调查数据等原始资料,对该地区的刻经地点、时间以及刻文本身做了综合性分析。^[189]邓星亮对卧佛院15个刻经窟中18种佛经进行综合研究,同时也探讨了造像和刻经之间内在关联所蕴含的佛教史意义;作者特别对刻经中的佚经、刻经版本、俗字等进行了研究。^[190]雷玉华等对四川石经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刻经的类别、安置形式以及目的作了分类研究。^[191]陈晶鑫对安岳石窟

刻经的发端进行了探讨,认为刻经的开凿与开元前期佛教面临的危机以及普州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192]方广锴对大足宝顶山小佛湾宋代大藏塔上刻的佛典目录进行了考订,认为该塔上所刻佛典依据为《开元释教录略出》与《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经录崇拜,对上述佛典原貌与流传形态研究具有史料价值,对研究赵智凤思想与活动具有参照意义。^[193]赵献超认为安岳石窟孔雀洞经目塔刊刻底本极有可能是当时所能见到的某部大藏经的目录,为了追求外观的严整效果对经目的顺序及名称作了微调,同时进一步指出经目塔是将供养佛塔与供养佛经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194]

张勋燎探讨了大足舒成岩道教石窟造像记道士、匠师题名的衔称,并且对题刻中“海元癸亥”“天元启运”等道教纪年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大足等地道士题名反映的道派内容与成都地区有差异,可能为不同道派活动区域所致;工匠的题名反映了昌州厢兵军工作坊“都作院”的工匠参与到了造像,反映了南宋初期大足道教造像受到官方支持的背景。^[195]宋世霖梳理了大足北山石刻中的供养人题记,从供养方式、供养人的身份以及供养人的诉求几个方面分析大足石刻世俗化问题。^[196]李晓敏通过对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题记进行梳理来探究这一时期民众对于佛教的信仰情况,其中用了较长篇幅探讨四川地区造像题记,特别涉及了密教造像题记以及官员造像题记。^[197]米德昉对宋代文氏工匠在宋代所作的造像及其时代特征进行了总结,并根据文氏造像样式推测其工匠参与到了宝顶山的开凿。^[198]高秀军对石篆山《严逊记》摩崖残碑及佛会寺明代《严逊记》碑作了校勘,通过分析认为佛会寺《严逊记》碑刻于明嘉靖年间,另对碑中反映的造像问题作了简单分析。^[199]陈明光对宝顶山《报德经变》题记中提到的高僧慈觉宗贇姓名、籍贯、宗派等问题作了考辨。^[200]陈云校勘及释读了安岳玄妙观《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指出玄妙观的道教造像是依据道教黄箓斋法而造。^[201]李小强通过三清古洞外何格非的生

平史料认为大足南山三清古洞营建时间为1136—1141年之间,南山出现道教造像,或与何正言崇尚道教密切相关。^[202]

董华锋以巴中南龛李思弘妆彩龕像为例,探讨石窟寺重妆现象,作者认为除了对造像本身及同时期开龕题记的研究,也应重视后代的妆修题记及其反映的历史背景和信仰转变的探讨。^[203] 李小强通过梳理明清时期的碑刻文献,梳理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5次妆金史,并对铭文中记录的妆金周期、病害表现以及隐含的人文信息进行了分析。^[204] 唐长清对宝顶山大佛湾石窟散见于碑刻、题记中的明清修缮史料作了整理,^[205] 还对宝顶山大佛湾第8号千手观音清末妆金碑记以及出资妆修者戴光昇及其家庭作了考证。^[206]

(六) 分布、景观及建筑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数量并不多,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窟龕分布与周边聚落关系的探讨;从景观考古角度对龕像本身显著性、视野范围和复杂度的分析;对茗山寺石塔与摩崖造像的关系研究;对窟龕中的建筑样式以及窟龕本身空间营造方法及对信徒影响的研究都摆脱了过去单纯对造像本身题材、时代的探讨。

李春晓对四川盆地摩崖造像的分布进行了研究,概括了造像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对影响四川盆地摩崖造像地域分布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对造像分布与政治因素、宗教政策、所在地的行政等级、经济发展以及地面寺院及高僧驻锡地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07]

朱柠从建筑学的角度对四川唐代西方净土变石窟中的仿木构建筑形制进行了研究。^[208]

孙华与陈筱通过对安岳茗山寺石塔残件的现状描述和原貌分析,得出了石塔建于南宋绍兴以后的南宋中晚期,塔的性质是赵智凤转法轮塔。通过石塔与摩崖造像的位置和内容的关联性分析,以及部分龕像内容的考辨,认为摩崖造像与石塔是统一营建的。^[209]

凤飞从景观考古的角度对川南唐宋摩崖造像的选址进行了分析,分析遗址的显著性、视野范围和复杂度,并结合窟龕分类研究对摩崖造像的

社会角色和作用进行探讨。^[210]

魏小豪对涪滩二佛寺造像的整体布局与营造、对具体造像的处理技法以及宏观的造像制式化等作了简单论述。^[211] 马梦圆对安岳卧佛院涅槃像的分析偏重于对造像构图、技法以及造型量度方面的探讨。^[212]

(七) 其它

主要涉及一些宏观理论的提出以及研究方向上的探讨。罗世平提出了“大足学”和大足石刻的6个问题,从宏观上提出了大足学要解决的问题和研究的方向。^[213] 肥田路美从日本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谈了巴蜀石刻艺术保护和研究的国际意义,并且从4个方面,即尊像的形式问题、主题与传播问题、尊像的作用问题、制作尊像的工匠探讨了这一主题。^[214]

三 总结

本文的梳理更多是为了反映近十年来川渝石窟及摩崖造像调查及研究的状况,以为研究者提供便利。以上的文献梳理存在疏漏,一些硕博士论文并未公开,同时发表于国内外期刊的一些研究由于条件所限无法全面收集。本文的分类也存在一定问题,大量的报告、简报中包含着研究部分,很难把基础资料刊布与研究截然分开,同时研究门类相互融合,很难做出精细划分。

总体来看,资料的刊布、研究的数量和视角方面都远胜于前,体现出学界对于川渝地区窟龕的重视。

但基础资料仍然存在很多欠缺。考古报告出版速度慢,已刊布资料也存在信息不够全面的问题。尽管学者对广元、巴中石窟已经做了综合研究,但广元皇泽寺、千佛崖、观音岩、巴中南龛、西龛等几处大型窟龕还没有考古报告公布,安岳迄今也仅出版了圆觉洞、卧佛院等地的调查报告,部分大型的石窟甚至缺乏完整的内容总录。川渝石窟分布分散,以中小型石窟为主,自然和人为破坏有加趋势,尽快有针对性地大型石窟以及中小型石窟的相应考古报告、内容总录、考古简报刻不容缓。

同时此前公布的一些简报和报告内容也存在缺憾:部分简报仅公布造像本身的情况,对周边环境、崖面的情况、窟龕周围的建筑遗迹、窟龕打破关系、开凿工艺都缺乏记录,部分成果没有完整的窟龕立面图和平面图,刊布的简报多提供照片而不公布线图,仅靠照片难以反映造像的详细情况,且照片本身多存在拍摄角度及质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后续研究,也极大制约了相关研究的开展。但三维测绘等技术的运用已经极大提升了材料公布的速度、质量以及全面性。

研究方面,目前围绕部分题材进行了大量重复性讨论。但如何从基础的造像题材释读提升到对当时川渝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信仰状况的研究,特别是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去深入揭示信仰的转变,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除了信仰层面的研究,社会层面的探讨也有待深入,特别是对川渝地区造像粉本的来源、造像的制作与妆彩工艺、工匠群体和技艺的传承、造像区域的选择等等,都有待深入的整理分析。

回归到一些具体问题,在题材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都提到了图像无法与经文完全对应的问题,这种现象恐怕与川渝地区的本地化改造有关。唐宋时期历史文献对该区域记录不多,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有赖于对题记、晚期地方文献的深入发掘以及对民俗、民间宗教等领域研究成果的汲取。

另外,目前的调查研究集中于造像本身,但有大量的题记以及文献证明在大型窟龕的周围往往分布有不同时代的地面寺庙以及其它地面建筑,这就要求研究者从单一的窟龕造像转向全面的宗教遗址研究。近年来发掘的重庆江津石佛寺遗址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寺庙建筑基址区、石上建筑遗迹区、摩崖造像区以及相关僧俗墓葬区等不同时代的遗存共同构成了一处完整的宗教遗址。因此除了对造像本身的关注,理应对造像周边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乃至发掘,以全面揭示遗址的面貌。

注释:

- [1] 此前已有部分文章对已有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参见:
 - a.张媛媛:《四川地区佛教摩崖造像发现与研究》,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5辑,第196~218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文章系统整理了2013年以前相关领域的成果;
 - b.邓新航、汪小洋:《2006—2015年中国佛教石窟研究综述》,《艺术探索》2017年第1期。文章对2006—2015年的中国佛教石窟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中包含部分对川渝石窟的调查研究成果;
 - c.米德昉:《大足石刻研究回顾(1945—2016)》,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2辑,第3~19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文章对大足石刻的研究史做了梳理。
- [2] 本文不涉及文物保护与科技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涉及川西高原的藏传佛教石窟及摩崖造像。
- [3] 雷玉华:《四川石窟分区与分期初论》,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0辑,第193~219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 [4] 雷玉华:《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第3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
- [5]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等编:《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巴蜀书社,2014年。
-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四川散见唐宋佛道窟龕总录·广元卷》,文物出版社,2018年。
- [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剑阁县隋唐道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
- [8] 广元千佛崖石窟艺术博物馆编:《广元千佛崖》,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年。
- [9] 张宁等:《四川广元千佛崖莲花洞考古新发现》,《四川文物》2020年第6期。
- [10]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巴中通江白乳溪摩崖造像调查简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7辑,第1~19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 [11]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通江佛尔岩窟、野猪窝及佛爷田坝摩崖造像调查报告》,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7辑,第20~35页。

- [12]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通江朱元观音岩元代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19年第7期。
- [1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博物馆编:《四川散见唐宋佛道窟龕总录·达州卷》,文物出版社,2017年。
- [14] 蒋晓春等:《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调查及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
- [15] 蒋晓春等:《营山县太蓬山石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2010年1期。
- [16] 蒋晓春等:《四川阆中石室观隋唐摩崖造像》,《文物》2013年第7期。
- [17] 蒋晓春等:《四川阆中雷神洞石窟内容总录》,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4辑,第1~8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 [18] 蒋晓春等:《四川阆中佛子岩石窟内容总录》,王胜明、金生杨主编:《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第75~8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 [19] 蒋晓春等:《四川剑阁老君庙石窟及题记时代考辨》,《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
- [20]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安岳岳阳镇菩萨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16年第3期。
- [21]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安岳上大佛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
- [22]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安岳舍身岩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
- [23]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安岳林凤侯家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17年第5期。
- [24]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安岳长河源石锣沟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17年第9期。
- [25]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安岳高升乡千佛岩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2辑,第255~276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 [26]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四川省安岳县偏岩乡佛岩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第37~52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 [27] 四川大学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四川安岳高升大佛寺、社皇庙、雷神洞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18年第6期。
- [28] 四川大学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四川安岳县三仙洞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6辑,第87~105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
- [29] 四川大学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四川安岳人和云峰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19年第4期。
- [30]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等:《四川安岳玄妙观唐代摩崖造像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4期。
- [31] 四川大学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四川安岳双龙街菩萨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3辑,第48~60页,重庆出版社,2020年。
- [32] 西南民族大学石窟艺术研究所:《四川安岳县茗山寺石窟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5年第3期。
- [33] 曾德仁:《四川安岳县玄妙观道教摩崖造像》,《四川文物》2014年第4期。
- [34] 大足石刻研究院等编:《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
- [3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安岳圆觉洞——四川安岳圆觉洞石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 [36] 雷玉华:《四川中部首次发现北朝佛教摩崖造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9期。
- [37] 大足石刻研究院编:《大足石刻全集》,重庆出版社,2017年。主要公布了大足境内的主要石窟,以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5处大型龕窟为主,另外对宝顶山周边的小型石窟材料也作了刊布。
- [38] 黄能迁等:《大足北山佛湾石窟考古调查新收获》,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1~23页,重庆出版社,2016年。
- [39]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中心:《大足妙高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

- 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3辑，第1~29页。
- [40]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中心：《大足妙高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3辑，第30~47页。
- [41] 大足石刻研究院：《重庆市大足区峰山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20年第6期。
- [42] 邓启兵等：《大足宝顶山石窟周边区域宋代造像》，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6辑，第76~115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 [43] 米德昉：《重庆市大足区宝顶山圣寿寺毗卢庵造像的调查与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
- [44] 杨光宇：《重庆大足“三宝寺”石刻造像考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著：《长江文明》第30辑，第19~2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18年。
- [4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潼南千佛寺》，科学出版社，2019年。此前已出版简报，参见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潼南县千佛寺摩崖造像清理简报》，《考古》2013年第12期。
- [46]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重庆地区唐代佛教摩崖龕像调查》，《考古学报》2014年第1期。
- [47]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合川区文物管理所：《重庆龙多山石窟调查简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5辑，第1~42页。
- [48] 蒋晓春等著：《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调查及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
- [49]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市江津区石佛寺遗址2016年度考古调查和试掘简报》，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7辑，第54~97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
- [50]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盐亭县文物管理所：《四川盐亭龙门堰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20年第10期。
- [5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 [52] 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都江堰市三佛洞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
- [53] 成都市文化局等编：《四川大邑县药师岩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考古报告》，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
- [5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津县老虎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成都考古发现（2015）》，第742~748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 [55] 符永利、刘超：《四川邛崃市盐水村夫子岩摩崖造像》，《敦煌研究》2020年第4期。
- [5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仁寿牛角寨石窟——四川仁寿牛角寨石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
- [57] 张毅、李勇主编：《仁寿石刻》，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年。
- [58] 符永利、刘超：《四川仁寿县冒水村大佛沟摩崖造像》，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9辑，第1~23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 [59] 四川大学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仁寿县文物管理所：《四川仁寿鳌陵乡黑龙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19年第4期。
- [6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仁寿县大化镇杀人槽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14）》，第501~510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 [61] 符永利、张婷：《四川洪雅县苟王寨摩崖造像内容总录》，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著：《长江文明》第25辑，第41~6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年。
- [62] 胡同庆：《沐川千佛崖石刻考察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著：《长江文明》第25辑，第32~44页。
- [6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贡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编：《四川散见唐宋佛道窟龕总录·自贡卷》，文物出版社，2017年。
- [6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高县半边寺摩崖

- 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5年第1期。
- [65] a.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
b.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c.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编：《大足学刊》第2辑，重庆出版社，2017年；
d.秦臻主编：《佛像、图像与遗产——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e.大足石刻研究院编：《2014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16年；
f.大足石刻研究院编：《大足石刻全集》，重庆出版社，2017年。
- [66] 胡文和、胡文成著：《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巴蜀书社，2015年。
- [67] 姚崇新著：《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中华书局，2011年。
- [68] 雷玉华著：《巴中石窟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
- [69] a.雷玉华等著：《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
b.董华锋、闫月欣：《四川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新典范——雷玉华等著〈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介评》，《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4期。
- [7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四川散见唐宋佛道窟龕总录·广元卷》，第21~32页。
- [71] 徐强：《川东北零散隋唐佛教窟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9年。
- [72] 王守梅：《四川广安冲相寺历史与石窟造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华师范大学，2017年。
- [73] a.陈晶鑫：《安岳唐宋石窟的分期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5年；
b.王丽君：《安岳唐宋石窟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9年。
- [74] 余靖：《安岳千佛寨摩崖造像的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7年。
- [75] 张媛媛、黎方银：《大足北山佛湾石窟分期研究》，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
- 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72~138页。
- [76] 任婧：《安岳卧佛院佛教遗迹的初步整理》，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4年。
- [77] 范丽娜：《合川涑滩二佛寺宋代石刻造像考察》，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20辑，第293~33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
- [78] 张亮：《丹棱郑山摩崖造像的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4年。
- [79] 张亮：《川西石窟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8年。
- [80] 谭登峰：《丹棱龙鹤山摩崖造像的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4年。
- [81] 卢丁：《成都周边地区唐代石窟造像样式形成的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 [82] 于春：《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
- [83] 蒋晓春等：《嘉陵江流域石窟寺分期研究》，考古杂志社编辑：《考古学集刊》第22集，第190~23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 [84] 于春：《蜀道的两端——南北朝隋唐时期长安与蜀地的佛教艺术交流》，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编：《西部考古》第17辑，第266~286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 [85] 姜宝莲：《广元千佛崖大云洞石刻佛像的调查研究》，《文博》2015年第4期。
- [86] 雷玉华：《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第422~424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
- [87] 符永利等：《阆中大像山石窟的形制、题材与时代》，《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6期。
- [88] 林圣智著：《从墓阙到浮图——四川绵阳平阳府君阙研究》，颜娟英、石守谦主编：《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第127~167页，2014年。
- [89] 符永利、刘超：《四川平杨府君阙阙身龕像的初步研究》，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7辑，第164~197页。
- [90] 温玉成等：《成都龙泉驿北周强独乐造像考察记》，《中原文物》2016年第2期。
- [91] 雷玉华：《成都龙泉区北周文王碑再调查》，

- 《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2期。
- [92] 胡文和：《蒲江飞仙阁9号窟相关问题考释》，《成都文物》2014年第1期。
- [93] 龙红等：《巴蜀隋代佛教石窟艺术初探》，《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5年第5期。
- [94] 龙红、邓新航：《巴蜀佛教石窟艺术与周边佛教艺术之关系——以唐以前的巴蜀石窟为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12期。
- [95] 邓新航：《巴蜀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5年。
- [96] 王剑平、雷玉华：《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四川造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研究（二）》，第358~371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原载于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麦积山石窟研究》，第388~402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 [97] [日]八木春生著，姚瑶译：《四川广元千佛崖武周至开元时期佛教造像研究》，《敦煌研究》2020年第2期。
- [98] 任婧：《〈涅槃经〉与涅槃像——以安岳卧佛院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9年。
- [99] 米德昉、李金娟著：《大足北山多宝塔内“娑罗双林示寂”造像的图像学意义》，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139~151页。
- [100] 黄能迁等：《宝顶山大佛湾第10号龕图像辨识》，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232~246页。
- [101] 董华锋：《从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信仰变迁与造像的重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 [102] 陈清香：《大足宋代石刻毗卢遮那佛造像探讨——以眉心顶上光芒为例》，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85~99页。
- [103] 高秀军：《宝顶山石刻佛佛“毫光”意涵探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同一论题见于高秀军著：《大足石刻佛“毫光”相探析——以宝顶石刻为中心》，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111~125页。
- [104] 孙明利：《四川唐、五代观无量寿经变光明转与宝船因素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4期。
- [105] 张亮、贺越洋：《四川丹棱石佛湾、佛儿崖石窟中的五十三佛、二十五佛造像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20年第5期。
- [106] a. [日]滨田瑞美著，许旻译：《夹江千佛岩的三佛龕、四佛龕》，高大伦等主编：《四川夹江千佛岩唐代佛教艺术研究》，第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日文版也见于本书；
b. [日]滨田瑞美：《唐代三世佛造像——以四川夹江千佛岩为中心》，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116~124页。
- [107] 符永利、王守梅：《四川广安冲相寺定光佛龕像研究》，《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
- [108] 陈佩姣：《四川地区药师佛造像及药师经变研究——兼谈与敦煌药师作品之异同》，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1年。
- [109] 符永利：《川渝地区唐宋药师佛龕像的初步考察》，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6辑，第48~65页。
- [110] 史文瑶：《唐代四川安岳石窟中的〈药师变〉和〈药师经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 [111] 米德昉：《唐宋时期大足药师造像考察》，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37~63页。
- [112] 张亮：《川渝地区9—10世纪日、月光菩萨造像研究》，《文物》2017年第12期。
- [113] 江滔、张雪芬：《9—13世纪四川地藏十王造像研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研究（三）》，第331~346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该文章与江滔观点基本一致，参见江滔：《四川地区9—13世纪地藏十王造像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3年。
- [114] 李小强：《大足北山第253龕地藏观音龕探析》，《敦煌研究》2019年第1期。

- [115] 张亮:《四川大邑药师岩新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相关问题讨论》,《敦煌研究》2017年第3期。
- [116] 董华锋等:《川渝地区晚唐五代小型经幢及其反映的民间信仰》,《考古》2018年第6期。
- [117] 姚崇新:《药师与地藏——以大足北山佛湾第279、281号龕造像为中心》,《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第371~395页,中华书局,2011年。后载于大足石刻研究院编:《2009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49~468页,重庆出版社,2012年。
- [118] [日]肥田路美:《关于四川地区的地藏、观音并列像》,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19~539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 [119] [日]肥田路美:《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中的地藏、观音并列像》,高大伦等主编:《四川夹江千佛岩唐代佛教艺术研究》,第35~69页。
- [120] 齐庆媛:《江南式白衣观音造型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4期。
- [121] 未小妹:《如意轮观音造像考察——以巴蜀石窟为主》,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207~236页。
- [122] 李小强、廖顺勇:《大足、安岳石刻数珠手观音造像考察》,《四川文物》2018年第1期。
- [123] 李滉:《四川宋代菩萨造像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
- [124] 李冠畿:《四川内江新发现摩崖浮雕观音救难图像考察》,《敦煌研究》2019年第6期。
- [125] 李小强:《十圣观音叙说——以大足石刻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9辑,第201~222页。
- [126] 李崇峰:《千手眼大悲像的初步考察——以大足宝顶为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6辑,第348~375页。
- [127] [日]罗翠恂著,庚地译,于春校:《四川西部中晚唐千手观音造像研究——以夹江千佛岩084号龕为例》,《四川文物》2015年第1期。中、日文版亦见于《四川夹江千佛岩唐代佛教艺术研究》一书。
- [128] 姚崇新:《大足地区唐宋时期千手千眼观音造像遗存的初步考察》,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152~194页。
- [129] 卢少珊:《四川唐代摩崖浮雕维摩诘经变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4期。
- [130] 米德昉:《大足北山宋刻〈维摩诘经变〉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3期。
- [131] 吴仁华:《巴蜀石窟之西方净土变相图像源流初探》,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161~174页。
- [132] 姚瑜:《大足石刻观无量寿经变造像研究——以北山245龕观经变、宝顶18龕观经变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7年。
- [133] 霍巍:《从于阗到益州: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图像的流变》,《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
- [134] [日]大岛幸代著,许曼译:《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的毗沙门天王龕——关于其造型特点与建造时期》,高大伦等主编:《四川夹江千佛岩唐代佛教艺术研究》,第182页。
- [135] 刘刚:《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毗沙门天王造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7年。
- [136] 刘青莉、姚崇新:《四川安岳西禅寺1号龕僧伽三十二化变相图及相关问题》,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13辑,251~28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
- [137] 李小强、邓启兵:《“成渝地区”中东部僧伽变相的初步考察及探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2辑,第237~249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38] 张亮等:《僧伽变相的内容、演变及形成:以安岳、简阳两铺摩崖造像为中心》,《敦煌研究》2020年第1期。
- [139] 梅林、季晓堂:《难信“地藏菩萨说”,疑是僧

- 伽变相窟：大足七拱桥第6号窟调查简记》，大足石刻研究院编：《2009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4~168页。
- [140] [日]肥田路美著，藏卫军译，于春校：《夹江千佛岩091号三圣僧龕研究》，《四川文物》2014年第4期，此文中、日文版亦见于《四川夹江千佛岩唐代佛教艺术研究》一书。
- [141] 徐汝聪：《试论僧伽造像及僧伽崇拜》，《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
- [142] 高秀军、李向东：《新发现资中月仙洞两龕僧伽变相初考》，《敦煌研究》2016年第2期。
- [143] 郑式：《佛装与佛化：五代至宋时期僧伽信仰图像的在地化》，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67~98页。
- [144] 张雪芬：《安岳卧佛院北宋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浮雕图像辨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0辑，第153~192页。
- [145] 张媛媛：《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5年。
- [146] 刘静：《宝顶圆觉洞与石羊华严洞左右壁图像之非“五十三参”辨》，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15~28页。
- [147] 刘光雨：《四川地区华严三圣信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华师范大学，2015年。
- [148] 黄夏：《四川省安岳县毗卢洞之千佛洞研究——以“千佛式”人物像为中心》，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41~65页。
- [149] 叶潜：《大足宝顶山圆觉洞跪像考》，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29~38页。
- [150] 卜向荣：《居间的图像——圆觉变相中的长跪菩萨像与宋代佛画论》，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100~115页。
- [151] 弓晓：《川北地区隋唐时期力士造像的发展与演变》，硕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2018年。
- [152] 雷萌：《巴蜀地区隋唐时期天众造像图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年。
- [153] 魏文斌、张利明编著：《西游记壁画与玄奘取经图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
- [154] 李小强、姚淇琳：《大足石刻宋代两组取经图简说》，《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
- [155] 赖依缙：《一字佛顶轮王与炽盛光佛——佛教星宿信仰图像的唐宋之变》，颜娟英、石守谦主编：《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第225页。
- [156] 周洁：《五代、两宋大足地区星曜造像图像学研究》，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99~110页。
- [157] 符永利：《重庆龙多山田湾3号龕的造像题材与年代》，《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
- [158] 吕德廷：《论大足石刻中的摩醯首罗天形象》，《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 [159] 胡文成：《印度诃利帝母神像在流传过程中的衍变探究》，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125~134页。
- [160] 褚丽娟：《石篆山3号龕人物形象辨析》，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3~14页。
- [161] 陈瑛：《从孔雀明王窟谈唐宋四川地区孔雀明王信仰的流传》，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127~155页。
- [162] 杨筱：《大足与安岳宋代石刻孔雀明王图像分析》，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195~231页。
- [163] 董华锋、张亮：《唐宋巴蜀地区十六罗汉造像的初步研究》，大足石刻研究院编：《2014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7~132页。
- [164] 于倩倩：《川渝地区唐宋时期十六、十八罗汉造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7年。
- [165] 邓宏亚：《四川唐代佛道合龕摩崖造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7年。
- [166] 李光明：《大足石刻造像与三教融合初探》，《中原文物》2020年第5期。
- [167] 刘睿：《绵阳玉女泉31龕天尊、老君合龕像研究》，《四川文物》2015年第5期。

- [168] 李淞:《大足宋代道教雕刻述略》,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310~328页。
- [169] 胡文和:《大足宋代道教造像的神祇图像源流再探索》,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243~257页。
- [170] 李小强:《12世纪道教艺术的杰作:大足南宋道教石刻——以大足佛儿岩石窟为主的追溯性考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著:《长江文明》第17辑,第21~33页,重庆出版社,2014年。
- [171] 王葑滢:《四川唐宋佛教摩崖造像中的供养人像整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8年。
- [172] a.王海涛、王婧:《宋代石窟舞蹈形象研究——大足石刻的典型性舞蹈造像》,《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b.王海涛等:《重庆“大足石刻”舞蹈形象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3年第1期;
c.王婧:《巴蜀石窟艺术中的宋代舞蹈造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4年。
- [173] 李金娟、高秀军:《大足石刻弥勒信仰下的两处“启门图”》,《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2期。
- [174] 陈明光:《大足石刻〈报恩经变〉疏理研讨——宝顶山大佛湾〈报恩经变〉图经为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5辑,第175~195页。
- [175] 李小强:《大足石壁寺石窟初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3辑,第259~273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 [176] 侯冲:《回归佛教仪式旧有时空——三论大足宝顶为佛教水陆道场》,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200~211页。
- [177] 戴晓云:《大足宝顶山并非佛教水陆道场——和侯冲教授商榷》,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6辑,第408~414页。
- [178] 邹建林:《庆赞小考》,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212~223页。
- [179] 丁明夷:《川密:四川石窟体系的发展轨迹》,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189~193页。
- [180] 邓新航:《巴中石窟唐宋密教造像探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著:《长江文明》第25辑,第21~31页。
- [181] a.陈悦新:《安岳石窟佛像着衣类型》,《文物》2016年第10期;
b.陈悦新:《大足石窟佛像着衣类型》,《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1期。
- [182] 邓启兵:《大足北山石刻军戎服饰初识》,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247~260页。
- [183] 徐顺智:《安岳石窟装饰图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4年。
- [184] 刘云:《巴中石窟龕楣装饰纹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5年。
- [185] 张蓓蓓:《唐宋大足、安岳佛教石刻云纹模式研究》,秦臻主编:《田野、实践与方法——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237~246页。
- [186] 龙莉:《大足石刻花卉鸟兽造型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1年。
- [187] 齐庆媛:《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造型分析——以服装、装身具与躯体形态为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5辑,第305~361页。
- [188] 齐庆媛:《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宝冠造型分析》,《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
- [189] 雷德侯等主编,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佛教石经(四川省)》第2卷,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4年。
- [190] 邓星亮:《四川安岳卧佛院石窟刻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2年。另作者出版同名专著,参见邓星亮:《四川安岳卧佛院石窟刻经研究》,巴蜀书社,2016年。

- [191] 雷玉华、樊拓宇:《四川石刻佛经的调查与研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研究(三)》,第389~431页。
- [192] 陈晶鑫:《试论安岳石窟刻经的发端》,《四川文物》2020年第6期。
- [193] 方广锴:《重庆大足宝顶山小佛湾大藏塔录文与研究》,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30~71页。
- [194] 赵献超:《四川安岳石窟孔雀洞经目塔与法宝崇拜》,《四川文物》2020年第6期。
- [195] 张勋燎:《大足舒成岩道教石窟造像记道士、匠师题名的衔称和道教纪年》,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224~242页。
- [196] 宋世霖:《大足北山石刻世俗化研究——以供养人题记为研究对象》,硕士学位论文,四川美术学院,2017年。
- [197] 李晓敏著:《世情与佛理——隋唐佛教造像题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
- [198] 米德昉:《宋代文氏一系工匠与宝顶山石窟寺的营建》,《敦煌研究》2020年第4期。
- [199] 高秀军:《大足石篆山〈严逊记〉碑补正及相关问题考略》,《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1期。作者对碑记与造像的对应关系另文进行了研究,参见高秀军、李金娟:《大足石篆山石刻“十四龕”造像问题考》,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149~160页。
- [200] 陈明光:《大足石刻慈觉禅师宗蹟研讨——以宝顶山大佛湾〈报德经变〉刻慈觉宗蹟为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6辑,第392~407页。
- [201] 陈云:《唐代安岳玄妙观道教碑文与造像研究》,《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4期。
- [202] 李小强:《大足南山三清古洞的开凿年代——兼及何格非生平事迹略考》,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2辑,第329~337页。
- [203] 董华锋:《巴中南龕李思弘重妆龕像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研究》2019年第5期。
- [204] 李小强:《大足宝顶山石窟千手观音妆金史探析》,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6辑,第376~391页。
- [205] 唐长清:《宝顶山大佛湾石窟明清修缮史料的整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9辑,第392~407页。
- [206] 唐长清:《宝顶山大佛湾第8号千手观音清末妆金碑记考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著:《长江文明》第35辑,第27~30页,四川美术出版社,2019年。
- [207] 李春晓:《5至13世纪四川盆地摩崖造像分布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
- [208] 朱柠:《四川唐代西方净土变石窟中的仿木构建筑形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7年。
- [209] 孙华、陈筱:《安岳茗山寺石塔的初步分析》,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编:《大足学刊》第1辑,第24~36页。
- [210] 凤飞:《川南唐宋摩崖造像选址的景观考古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7辑,188~208页。
- [211] 魏小豪:《以涪滩二佛寺摩崖造像为例解析其造像的营造法则》,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18年。
- [212] 马梦圆:《安岳卧佛寺石窟群造像的营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5年。
- [213] 罗世平:《问学大足石刻》,秦臻主编:《佛像、图像与遗产——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3~19页。
- [214] [日]肥田路美:《巴蜀石刻艺术保护、研究的国际意义》,秦臻主编:《佛像、图像与遗产——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第205~216页。

(编辑 张春秀)